

3. 閱讀好時代特徵（三）：出版繁榮

春秋戰國時期還沒有現代意義上的出版。當時是在竹簡木牘上抄寫，成本比較高，複製能力很弱，而且不利於傳播。後來是絹帛，比較利於傳播了，可是成本更高，但是較之於龜板刻畫，已經比較普及了，行業算是有了很大的進步和繁榮。

漢代處於我國文字載體由甲骨、青銅、石頭發展到簡牘乃至紙張的轉型時代。西漢時期，簡牘仍較流行，竹簡烘焙、防蛀的技術更為成熟。秦人對於竹簡製作技術已經較成熟，但第一次用文獻把此工藝記錄下來的是漢人。紙張在西漢已經出現，“灋橋紙”“金關紙”“中顏紙”就是西漢時期的。東漢出現了以植物纖維為原料的“蔡侯紙”。“蔡侯紙”的出現是紙張技術產業化的飛躍，大大便利了書籍的出版，對閱讀的普及做出了巨大的貢獻。漢代時期抄書的人越來越多，甚至出現了一種職業抄書人，大大增加了書籍的複製量。出版品種也急劇增加。漢代出版的六藝之書即有“一百三家，三千一百二十三篇”。文學書籍也極豐富，有“詩賦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漢代還開了書籍貿易之先。先秦時期著書，無名無利，不過是作者想發表自己的思想，所謂“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主”。漢代產生了專門從事書籍複製的人和專門從事書籍貨賣的行業，書籍開始進入市場，書籍貿易發生。書肆出現了，而且不是個別現象，經營方式靈活，敞開售書，允許自由閱覽，客觀上還起著當時尚未出現的公共圖書館的作用。

唐代出版業已經趨向成熟。中國是印刷術的故鄉，在唐代，印刷出版業已經發展起來。雖然當時複製出版物仍然是人工手抄居多，可雕版印刷已經有所普及。今天我們在博物館裏能夠看到，唐代的出版商在印賣的出版物上刻印有“成都府成都縣龍池坊卞家”“京中李家”“上都東市刁家太郎”等，均已打出字型大小。有地點，有姓氏，有的還有排行，亮牌子，招客戶，可見當時的出版物市場已經形成。只是，當時的書籍裝幀主要是經摺裝、旋風裝、蝴蝶裝、包背裝等形式，及至宋代主要還是用冊頁，明代才大規模出現今天人們所看到的線裝書。曾經熱播的古裝電視連續劇《武媚娘傳奇》中，唐代初年的武媚娘居然在皇宮裏翻閱線裝書，實在是鬧了一個常識性的笑話。早些年拍攝的電視連續劇《西遊記》，也鬧過這方面的笑話，唐僧師徒曬的經書竟然也是線裝的。唐僧這些人物的背景是唐代，唐代那個時候實在還不曾有線裝書技術。

宋代的雕版印刷大為盛行，還發明了活字印刷術。宋代的出版經營更是空前繁榮地發展。官刻、私刻、坊刻都有較大發展。特別是坊刻，也就是民營出版業，使得市場化經營空前活躍。南宋時期，在坊刻這一行業中，浙版書、蜀版書、建版書，成一時之盛。三大版之一的建版，今人可能比較陌生，主要是指福建省建陽地方出版的圖書。建版書當時佔全國市場很大份額。南宋儘管只是中華大地的半壁江山，偏安一隅，然而文化和出版活動相當繁榮。由於書籍的普及，以往士大夫的生活倫理逐步影響了普通民眾，與此相適應地，那時產生了“朱

子讀書法”。朱子的教學遊歷主要以福建為中心，這與當時建版書尤其盛行應當有一定的關係。

宋代出版在官刻、私刻、坊刻三大系統之外，還有寺觀刻書和書院刻書兩大系統也十分重要。宋代出版業善本迭出，宋版書五大系統刻書的整體品質比較好，一直是後世翻刻古籍的範本。值得一提的是宋元時代，書院教育遍佈各地，在刻書事業上形成了不同於官、私、坊刻的新特點，其書目主要圍繞教學和研討，涉及學術面廣，有直接服務於學術思想和教學內容的流派傳承，如《朱子語類》《嶽麓書院課藝》《國朝文類》等。宋代書院發展到元代，全國共有 227 所，刻書品質達到較高水準，其中園沙、梅溪、西湖書院刻本聞名於世。

明代尤其是晚明時期也是我國古代書籍出版的活躍期。據楊繩信《中國版刻綜錄》一書記載，整個宋代共有 319 年，出版書籍 362 種，在宋至明末的 684 年裏，能查到出版時間的書籍有 3094 種。可以確認，有 2019 種出版於晚明嘉靖、萬曆至崇禎這大約一百年間，佔比例 65%，可見當時的書籍出版十分盛行。書籍的形態從以前的卷子本變為冊子本，宋代那些只是以寫本形式流傳而顯得彌足珍貴的書籍現在竟然較易尋覓得到，為此大學士蘇東坡在他的名篇《李君山房記》中埋怨“書益多，世莫不有，然學者益以苟簡”。

出版業繁榮不僅要看書籍出版數量，更要看書市的活躍程度。萬曆年間，書籍出版“異書輩出”，種類繁多，吸引各種讀者。當時南京三山街也就是今天南京的夫子廟一帶，那是

明代南京最為繁華的地段，明人彩繪《南都繁會圖卷》上繪有三山街的 109 個店舖招牌，其中有不少即標明“書舖”“畫寓”“刻字鐫碑”字樣。清初作家孔尚任創作的歷史傳奇劇《桃花扇》，劇中書商蔡益所的唸白就描繪了一番南京書市的繁榮景象：“天下書籍之富，無過俺金陵；這金陵書舖之多，無過俺三山街；這三山街書客之大，無過俺蔡益所。（指介）你看《十三經》《二十一史》、九流三教、諸子百家、腐爛詩文、新奇小說，上下充箱盈架，高低列肆連樓。”作家把許多相互間差距極大的書籍放在一起來唸白，剛說完《十三經》《二十一史》，就說九流三教，才說罷諸子百家，立刻說腐爛詩文，產生一種混搭的幽默感，盡顯當時出版業的開放繁榮景象。

到了晚清，我國開始從歐洲進口現代印刷機器，出版業有了快速發展。1897 年，夏瑞芳、鮑咸恩、鮑咸昌、高鳳池四人在上海創辦商務印書館，就是從歐洲買來新式印刷機，以印刷商務會計簿冊起步，後來才轉入圖書出版業。維新人士張元濟先生 1902 年應邀加入商務印書館，他組織編輯出版新式學堂中小學課本，出版新式字典及“世界文庫”等，成為中國現代出版業的開端。20 世紀初期，上海民間出版風起雲湧，商務印書館、中華書局、良友出版公司、世界書局、開明書局、生活書店等一大批優秀出版機構應運而生，快速發展，為變革中的社會提供了寶貴的精神食糧，為廣大民眾的閱讀生活做出了貢獻。

歐洲也有類似的情況。我們在第一章中介紹過，1450 年

之前，偌大個歐洲只有一家印刷所，古登堡發明印刷機後，不到五十年，全歐洲迅速發展出 250 多家印刷中心，1700 多家印刷所。印刷術的發展使得閱讀迅速發展。僅僅兩代人的時間，歐洲的讀者從幾萬增至幾十萬，甚至推動了宗教革命和文藝復興運動。

4. 閱讀好時代特徵（四）：政策開明

政府的政策是鼓勵閱讀還是輕視閱讀，甚至是“封殺”閱讀，這是閱讀好時代還是壞時代最重要的特徵。周朝就有圖書館——藏室。春秋戰國，諸侯鼓勵上策論，鼓勵閱讀。秦始皇焚書坑儒，儘管後人說焚燒的只是儒家典籍，醫農工商的書籍還是放得過的，可無論如何那也不會是一個鼓勵閱讀的時代。

在中國古代，作為宣導讀書的政策，最開明也最有效的莫過於開科考試。

漢代採取“選舉入仕”的辦法，主要由各地官員羅致名士，逐級推選人才，交由朝廷策試，通過者就可以成為官員。只是當時詔舉沒有定期，不像後來的科舉選拔那麼規制化。漢武帝時期，在長安興太學，經過童子科人才選拔，年齡在 12-16 歲，能夠“博通經典”的人才可以選入太學培養，從學生中選拔官吏，使得儒學在各郡縣得以推廣和傳播，大大提高

了讀書人的地位，使得社會上讀書風氣更加濃厚。最初，太學只有太學生 50 人，到了東漢光武帝時期，太學的規模已經擴大到 3 萬太學生，足顯當時社會閱讀盛況和崇學向上的風氣。

隋唐時期基本成形的科舉制度，對於天下讀書人無疑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和推動力。從我國有文字記載的歷史來看，凡是比較風清氣正的朝代和社會，官員們普遍好讀書，因為原則上不讀書是做不成官的，“學而優則仕”，成了一個悠久的良性傳統。古代歷朝的大多數官員是自幼入學，經過若干年嚴格的訓練和伏案閱讀，通過讀書增長知識，提升自我的品格，有抱負的更是要養成高遠的思想境界，這才能“入仕”。這就是說，是讀書造就了人才，讀書成就了官員。沒有若干年寒窗苦讀的人，沒有對經典學問有一定造詣的人，是不可能通過嚴格的科舉考試進入官場的。官員一旦進入官場，日後晉升的條件，不僅要看其政績，也要看其文化修養的高下，後者是前者的鋪墊和補充。用人政策是社會發展的最大導向。古代讀書人“入仕”的政策，自然對社會閱讀的風氣有許多正向的引導和激勵。

大凡延續時間比較長的朝代，都是比較鼓勵閱讀的時代。秦朝只延續了十四年，與當時實行嚴酷的文化管理，特別是焚書坑儒，有很大關係。擁有“大漢四百年”的漢代，雖然在漢武帝時期“獨尊儒術，罷黜百家”，可是這只是針對漢代官員的要求。在漢代，不能背誦幾千字儒經（主要是《論語》《孝經》）是不可能做官的。實際上，政權治理實踐還是“外儒內

法”，而社會閱讀並沒有禁絕儒學之外的其他書籍，當時的《莊子》《淮南子》這些書籍都是暢銷書。隋朝只存在了三十八年，也是政權延續時間較短的朝代，卻與是否鼓勵閱讀並無關。恰恰相反，開國皇帝隋文帝首創科舉制度，帶來了社會閱讀良好景象，開創了開皇之治的繁榮，可是，繼位者隋煬帝的內外舉措過度消耗國力，導致社會矛盾加劇，再加上關隴集團內部的矛盾爭鬥，致使李唐王朝上位。隋唐時期科舉制度的延續，社會閱讀的繁榮，倒是隋朝作出的重大歷史貢獻。

延續時間比較長的朝代，朝廷常常還會組織編修大型類書，讓天下讀書人為之振奮向學。初唐及中唐時期的類書《北堂書鈔》《藝文類聚》《初學記》《白氏六帖》最為著名。《藝文類聚》是唐高祖時由歐陽詢主編的唐代第一部官修類書。《初學記》是唐玄宗時的官修類書，被認為是類書編修中的精品。宋朝的宋太宗親自審讀規模很大的《太平御覽》，收集摘錄1600多種古籍的重要內容。明朝永樂皇帝（明成祖）朱棣，一俟政權穩定，即下令編撰《永樂大典》（初名《文獻大成》），是一部比《太平御覽》規模還要大的百科全書式的文獻集，彙集了古今圖書七八千種。這當然是偃武修文的盛舉，也是皇帝重視文章和閱讀的重要信號，對於社會閱讀風氣的形成大有益處。

清朝康熙皇帝下旨彙編《古今圖書集成》，乾隆皇帝主持編修《四庫全書》，也都是巨大文化工程。《四庫全書》的得失姑且不去論它，卻也都是當時朝廷重視文章書籍、帶動社會

閱讀的重要舉措。

我國古代書籍出版初期，大致是由官署刊行，整個宋元兩代，也一直是官方出版為主流。到了明代，官刻本數量雖然在增加，可私人出版已經盛行，整個明代的私刻本書籍總量超過了官刻本。與此同時，用來經營賺錢的坊間刻本數量更是快速增長，可以用繁盛來形容當時書市的情景。據張秀民《明代南京的印書》一文統計，晚明時期南京官私刻書機構達 20 餘所，民間書坊更有三山堂、三樂齋、文英堂、文進齋、芥子園、寶仁堂、萃文書屋、富春堂、世德堂、文林閣、大業堂、嘉賓堂、少山堂、奎璧齋、孝友堂、三多齋、九如堂等 57 家，數量非常可觀。特別引起現代出版史專家興趣的是，當時的官府竟然也在刊刻通俗小說，其中有《三國演義》《水滸傳》，還有其他通俗性書籍，如《山歌》《四時歌曲》等。當時出版業進一步世俗化、市場化的趨勢，當然十分有利於推動社會閱讀。

晚清時期的社會閱讀管理越來越趨向放鬆，儘管還發生過官署禁書的事件，但是，非常明顯，晚清政府對文化的管理已經是強弩之末。同治七年，朝廷要求各省查禁有傷風化的書籍，只有江蘇巡撫丁日昌最為下力氣，著力實施了查禁淫詞小說、邪說傳奇的行動，查禁了《紅樓夢》《西廂記》一類有言情內容的書籍戲曲和《水滸傳》一類的邪說傳奇，而且把禁書名目清清楚楚地開列出來，鬧鬧騰騰，張榜公佈於大街鬧市，等於為民間老百姓的“快樂閱讀”開了一個書目，引得人們

好奇心頓起。於是，“雪夜閉門讀禁書”成了最令文人雅士快樂的事情。就是不識字讀不了書的文盲，也難免尋著讀書人講禁書，聽故事，以至於有人說：“按以上各書，羅列不可為不廣，然其中頗有非淫穢者。且少年子弟，雖嗜淫豔小說，奈未知真名，亦無從遍覽。今列舉如此詳備，盡可按圖而索，是不啻示讀淫書者以提要焉夫？”這一次晚清最大規模的禁書反而成為一次閱讀大普及，在閱讀史上留下了一個笑談。

晚清時期，西風東漸，真正能夠動搖清朝統治的不再是什麼淫詞小說、邪說傳奇，而是從西方引進的先進思想。可是當時官員對於這一類書籍顯得十分驚鈍，未能做出禁毀的反應。而許多洋務大臣，像曾國藩、張之洞等，腦洞已經打開，不僅不會追查閱讀異端邪說的事情，甚至還帶頭主張“師夷長技以制夷”。在兩江總督曾國藩的倡議下，中國建造了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中國近代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受到了深遠影響。湖廣總督張之洞在“戊戌變法”前夕，寫下名篇《勸學篇》，強調“中學為體，西學為用”，一時成為中國學界的主導思想之一，而對於以往“一心唯讀聖賢書”的讀書人而言，無疑是一次教育革命，對於整個社會的閱讀政策有著顛覆性的改變。洋務運動以來，譯書院、同文館一類的翻譯出版機構陸續開辦，使得大量的外國先進思想著作能夠通過翻譯進入近代中國社會，晚清民初閱讀繁榮景象由此形成。

5. 閱讀好時代特徵（五）：名人領讀

我國民間歷來十分注意用名人勤學苦學的故事來帶動後人的閱讀。

最古老的名人閱讀故事是“學富五車”的故事。先秦時期的著名思想家惠施，是先秦名家學派的代表人物，讀書多，知識淵博，受到和他同時代的莊子稱讚：“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後來就用“學富五車”來表示一個人的知識淵博。

“懸樑刺股”講的是兩個古老的苦讀故事。一是“錐刺股”，說的是戰國著名謀士蘇秦發憤讀書的故事，讀書到深夜，每當要打瞌睡時，他就用錐子刺一下大腿來提神；二是“頭懸樑”，說的是西漢儒學大師孫敬刻苦讀書，每到深夜，怕自己睡著，就把頭髮用繩子繫在屋樑上。

“囊螢映雪”成語分別說的是晉代車胤和孫康夜以繼日、苦學不倦的故事。兩人家裏都很貧困，夜裏沒有照明讀書的條件，車胤就把很多螢火蟲捉到一起，藉著螢火蟲的光讀書，孫康則是就著雪夜裏的微光讀書。

“鑿壁偷光”成語說的是西漢著名經學家、丞相匡衡自幼貧寒，把鄰居家牆壁裂縫鑿大，藉著鄰居家的燈光讀書的故事。

“帶經而鋤”的典故說的是漢代位至三公的兒寬勤學的故事。兒寬受業於孔子的十一世孫孔安國，家裏很窮，只能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鋤地的時候都帶上經書，一到休息時就誦